

# 跨文化交际视角下国际中文教育中的文化冲突与适应策略 ——以泰国商会大学为例

陈春晓\* 吴元超

(泰国商会大学, 泰国 曼谷 10400)

**摘要:**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 泰国国际中文教育规模持续扩大, 但中泰文化差异引发的教学冲突日益凸显。本文以泰国商会大学为例, 基于跨文化交际理论, 采用混合研究方法深入探究了泰国佛教价值观与社会等级观念对中文教学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 中泰双方在语言禁忌、非语言行为及教学评价观念上存在显著冲突, 制约了教学实效。针对上述问题, 本研究提出了包含教材本土化修订、教师跨文化纠错策略优化及“双轨适应”机制在内的系统性策略, 旨在为提升对泰中文教学质量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 跨文化交际; 国际中文教育; 文化冲突; 适应策略; 泰国商会大学

## 一、绪论

### (一) 研究背景

#### 1. 宏观背景: “一带一路”倡议下泰国中文教育的规模化与隐忧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 中泰两国在经贸、文化及教育领域的合作日益紧密, 推动了泰国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跨越式发展。作为东南亚地区中文教学规模最大的国家之一, 泰国不仅将汉语列为继英语之后的第二大外语, 更构建了涵盖基础教育至高等教育的完整教学体系。据吴应辉(2020)在《汉语国际教育发展报告(2019-2020)》中的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2022年, 泰国学习汉语的人数已突破100万大关, 开设中文课程的高校数量达到68所。这一数据的背后, 折射出泰国社会对中文人才的强劲需求。

然而, 在规模持续扩张的繁荣表象下, 教学质量的内涵式提升却面临严峻挑战。数量的增长并未同步带来教学效果的质变, 中泰文化差异引发的深层矛盾日益凸显。部分高校虽然开设了中文专业, 但学生在跨文化交际能力上的短板依然明显, 甚至出现了因无法适应中国教师的教学风格而导致的高流失率现象。这种“规模大、效益低”的现状, 迫使学界开始反思: 在宏观政策红利之外, 如何解决微观教学场域中的文化适应问题, 已成为制约泰国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瓶颈。

#### 2. 中观背景: 通用教学资源与本土文化需求的结构性错位

从教学资源配置的中观层面来看, 现行的课程体系与教材内容存在严重的“水土不服”。赵金铭(2004)曾明确提出“国别化”教材开发的必要性, 指出教材应适应对象国的文化习俗与思维方式。然而, 目前泰国高校普遍采用的仍是面向全球学习者的通用型汉语教材。这类教材往往以中国北方文化为蓝本, 缺乏对泰国本土社会文化的关照, 甚至包含与当地宗教习俗相悖的内容。

最为典型的案例是教材中的饮食文化板块。吴应辉(2020)的研究指出, 部分汉语教材中频繁出现的“猪肉”菜品图片或“饮酒”交际场景, 直接触犯了泰国穆斯林学生及严格佛教徒的宗教禁忌, 导致教材在推广过程中遭遇抵制, 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情感与接纳度。此外, 在教学法层面, 中国教师普遍推崇的“严师出高徒”与“直接纠错”理念, 与泰国社会根深蒂固的“面子文化”及佛教“温和沟通”原则产生了剧烈碰撞。李泉(2005)的调查发现, 这种教学风格的差异导致师生关系紧张, 甚至引发学生的心理防御机制, 使课堂互动陷入僵局。这些结构性错位表明, 现有的教学模式已无法满足泰国学生日益增长的本土化学习需求。

**作者简介:** 陈春晓(1997-), 女,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国际中文教育、中文+职业教育。

吴元超(1997-), 男,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国际中文教育、专门用途汉语。

**通讯作者:** 陈春晓

### 3. 微观背景：泰国商会大学商务中文教学的特定困境

具体到本研究的个案——泰国商会大学（University of the Thai Chamber of Commerce），其面临的挑战具有鲜明的代表性。作为泰国著名的私立商科院校，该校中文项目以“商务汉语”为核心特色，旨在培养具备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其生源结构复杂，既包含华裔学生，也包含大量无中文背景的泰国本土学生，且深受商科职业导向的影响。

在实际教学中，该校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学生深受泰国“萨那伊”（Sanuk，追求快乐）文化与佛教价值观的影响，倾向于轻松、和谐的学习氛围，抗拒高压式的知识灌输；另一方面，商务汉语教学本身要求高度的准确性与严谨性，中国教师往往采用高权力距离的教学管理方式。这种教学目标与学生文化心理的错位，导致了课堂沉默、作业拖延乃至退课等一系列教学管理难题。因此，以泰国商会大学为例，剖析其文化冲突的独特表征与成因，对于探索私立应用型高校的中文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样本意义。

## （二）研究问题

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并非旨在泛泛讨论中泰文化差异，而是聚焦于泰国商会大学的教学现场，通过实证研究回答以下三个核心问题：

第一，冲突表征问题：在泰国商会大学的国际中文教育实践中，价值观（如面子观念）、语言交际（如称谓系统）及教学实践（如评价方式）三个层面究竟存在哪些典型的、高频的文化冲突表现？

第二，深层机理问题：泰国本土独特的佛教文化（如因果观、宽容精神）与社会等级观念（如权力距离），是如何渗透并制约师生互动模式及教学效果的？其背后的文化心理机制是什么？

第三，策略构建问题：面对上述冲突，如何构建一套兼顾文化敏感性与教学实效的“双轨适应”策略体系？如何在教材修订、教师行为调整及学生能力培养等方面实现本土化重构？

## （三）研究意义

### 1. 理论意义：构建基于宗教文化的跨文化分析框架

在理论层面，既往关于国际中文教育文化冲突的研究，多直接套用霍夫斯泰德（Hofstede）的文化维度理论或舒曼（Schumann）的文化适应模式。虽然这些西方经典理论具有普适性，但往往难以精准解释东南亚特定宗教文化背景下的微观教学现象。王建勤（2018）指出，传统研究缺乏对对象国本土宗教与社会文化的针对性剖析，导致解释力不足。

本研究尝试突破这一局限，创新性地将泰国“佛教价值观”与“萨那伊社会文化”纳入分析视野，构建基于本土情境的“佛教文化适配框架”（Buddhist Culture Adaptation Framework）。这一尝试不仅弥补了现有研究在宗教文化与语言教学法关联性分析上的空白，也丰富了国际中文教育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体系，为解释儒家文化圈与南传佛教文化圈的教育互动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 2. 实践意义：服务于泰国高校中文教学的本土化改革

在实践层面，本研究坚持“问题导向”与“应用导向”。通过对泰国商会大学的深入个案分析，本研究提出的一系列本土化适应策略——如规避宗教禁忌的教材修订方案、基于“面子文化”的间接纠错技巧、以及利用VR技术进行的跨文化模拟训练——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

这些策略不仅能够直接解决泰国商会大学当前的教学痛点，提升其商务中文人才的培养质量，同时也为泰国其他公立及私立高校，乃至越南、柬埔寨等具有相似宗教文化背景的东南亚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教学改革范本。这对于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文教育的本土化进程，实现从“输血”向“造血”的功能转变，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 二、文献综述

本研究的理论根基在于跨文化交际学（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核心框架。为了深入剖析泰国商会大学中文教学中的文化冲突现象，本章将从跨文化交际的核心理论模型、国际中文教育中的文化冲突研究现状，以及泰国语境下的特殊性与研究空白三个维度展开系统综述。通过梳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旨在厘清现有研究的贡献与局限，从而确立本研究的理论坐标与切入路径。

### （一）跨文化交际核心理论的适用性分析

跨文化交际理论为分析教育场域中的文化差异提供了重要的解释工具。其中，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拜拉姆的跨文化能力模型以及文化适应理论，构成了本研究分析师生互动与冲突机制的基石。

### 1. 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与中泰差异

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于1980年提出的文化维度理论，是跨文化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框架之一。他提出的“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和“个人主义/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维度，对于解释中泰师生关系具有极强的解释力。

根据Hofstede (1980) 的研究，中国和泰国均属于高权力距离国家，但在具体表现上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同构”。中国的高权力距离往往体现为“尊师重道”的儒家伦理，强调教师的绝对权威与知识传授者的中心地位；而泰国的权力距离则深受“萨那伊”（Sakdina）等级制度与佛教观念的影响，表现为对长辈与上位者的绝对顺从与礼貌（Charubusp, 2022）。王建勤（2018）指出，这种理论层面的相似性往往会掩盖实际互动中的差异：中国教师期待的是“严厉的权威”，而泰国学生习惯的是“仁慈的权威”。当中国教师试图通过严厉管教来建立威信时，往往会与泰国学生期待的温和、宽容的师长形象发生冲突。

此外，Lyu (2023) 在针对泰国高校的研究中发现，虽然中泰同属集体主义文化，但泰国的集体主义更偏向于“松散的附属关系”，强调群体内部的和谐与快乐（Sanuk），这与中国文化中强调集体奋斗与责任的“紧密型集体主义”存在本质区别。这一理论视角的引入，为解析课堂纪律管理中的冲突提供了新的维度。

### 2. 拜拉姆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型

迈克尔·拜拉姆（Michael Byram）于1997年提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ICC）模型，将跨文化能力解构为“态度、知识、技能（发现/互动）、批判性文化意识”五个维度。这一模型已成为国际中文教师能力标准制定的重要参考。

崔希亮（2010）在《国际汉语教师标准与能力研究》中强调，传统对外汉语教学过分侧重“语言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Byram模型中的“态度”维度，即对异文化的开放心态与悬置评价的能力。在泰国商会大学的语境下，教师若缺乏这种跨文化态度，极易将泰国学生的“迟到”或“沉默”简单归因为“懒惰”或“不专心”，而非从文化差异的角度去理解其背后的时间观念与面子文化。因此，本研究将基于Byram模型，重点考察师生在冲突情境下的跨文化态度与互动技能。

### 3. 动态文化适应理论

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是一个动态的心理变化过程。刘珣（2000）结合舒曼（Schumann）的文化适应模式指出，学习者在接触异文化时通常会经历“蜜月期—挫折期（文化休克）—调整期—适应期”的U型曲线。

江新（2018）的实证研究进一步量化了这一过程，发现教师与学生在跨文化接触的第3-6个月是“文化休克”的高发期。在这一阶段，由于语言障碍与价值观冲突的叠加，师生双方的焦虑感达到峰值。对于泰国商会大学的学生而言，大一新生的退课率最高，正符合这一理论预测。既往研究多关注留学生在中国的适应问题，而忽视了本土学生在“家门口”学习外语时，同样会经历深度的“心理与文化适应”挑战（Psychological and Cultural Adaptation）。本研究将借此理论，分析教学策略介入的最佳时机。

## （二）国际中文教育中的文化冲突研究现状

随着国际中文教育的全球化推进，学界对文化冲突的关注点已从宏观的文化对比转向微观的教学实践。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价值观、语言交际及教学法三个层面的冲突。

### 1. 价值观层面的深层碰撞

价值观冲突是隐性且最具破坏力的。李泉（2005）在《对外汉语教学理论思考》中指出，价值观差异是导致教学效果不佳的根本原因。其中，“群体导向”与“个体竞争”的矛盾尤为突出。中国教师习惯通过小组竞赛、公开排名等方式激励学生，这源于中国文化中“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竞争价值观（张占一，1990）。

然而，Sukamolson (2021) 的研究表明，这种竞争机制在泰国课堂往往失效。受佛教“知足常乐”与“不争”思想的影响，泰国学生更倾向于避免冲突与竞争，过度强调排名反而会引发学生的心理不适与逃避行为。此外，时间观的差异也是研究热点。吴应辉（2020）提到，中国文化的“线性时间观”（守时、效率）与东南亚地区的“多向时间观”（弹性、当下）常常引发考勤与

作业提交上的摩擦，这种冲突在商务汉语教学中尤为致命，因为商务场景本身对效率有着严格要求。

## 2. 语言与非语言交际的符号误读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义的深层文化附加义往往是误解的源头。刘颂浩（2015）分析了汉语词汇在跨文化语境下的语义偏移现象。例如，“老实”一词在中国语境下多含褒义（诚实、可靠），但在某些东南亚语境中可能被解读为“愚笨、不懂变通”。Charubusp (2022) 专门研究了中泰语言互动中的“礼貌原则”，指出泰语复杂的敬语系统（如针对僧侣、皇室、长辈、平辈的差异化代词）使得泰国学生难以适应汉语相对扁平的称谓系统，常出现“称呼不当”而被中国教师误认为无礼。

在非语言交际领域，李晓琪（2016）的研究揭示了体态语的巨大差异。例如，中国教师习惯用眼神直视学生以示关注与真诚，但在泰国文化中，直视长辈或上位者被视为挑衅（Aggressive）。同样，中国教师为表示亲切而轻拍学生肩膀或头部的行为，在视头部为神圣部位的泰国文化中属于严重禁忌。这些非语言信号的误读，往往在无声中破坏了师生间的信任基石。

## 3. 教材内容与教学评价的制度性冲突

教学资源非本土化是引发冲突的客观因素。吴应辉（2020）在《汉语国际教育发展报告》中列举了大量案例，指出通用型教材中存在的宗教与习俗盲区。例如，部分教材在介绍中国饮食文化时，大量使用猪肉菜品图片，或在社交话题中设置“劝酒”场景，这直接触犯了泰国穆斯林学生及遵守五戒的佛教徒的禁忌，导致教材被拒用。

在评价体系方面，郑艳群（2019）通过对国际中文课堂互动的量化分析发现，中国教师偏好“结果性评价”与“纠错反馈”，认为指出错误是教师的职责；而泰国学生则深受“面子文化”影响，倾向于“过程性评价”与“鼓励式反馈”。直接的纠错不仅不能帮助学生改正，反而会容易导致高达 65% 的“防御性沉默”。这种教与学观念的错位，直接导致了教学效率的低下。

### （三）泰国中文教育的特殊性与研究空白

尽管既往研究成果丰硕，但在针对泰国，特别是泰国商科类高校的专门研究上，仍存在明显的视阙盲区。

#### 1. 泰国佛教价值观的渗透性影响

相比于其他东南亚国家，泰国的特殊性在于其佛教文化与现代社会的深度融合。Sukamolson (2021) 虽探讨了佛教价值观在课堂中的体现，但多停留在现象描述层面。王佳旻（2020）指出，目前的理论研究尚未深入剖析佛教的“因果观”（Karma）如何影响学生对学习成败的归因。例如，学生可能将考试失利归结为“运势”而非“努力不足”，这直接挑战了中国教师推崇的“人定胜天”的教育信念。现有文献缺乏对此类深层心理机制的系统性解释框架。

#### 2. 区域与类型研究的非均衡性

吴勇毅（2017）敏锐地指出了东南亚汉语教学研究的“区域差异”。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泰国公立大学（如朱拉隆功大学）或孔子学院，关注的是通识性汉语教学。然而，针对私立大学及\*\*职业导向型（如商务汉语）\*\*课程的研究相对匮乏。泰国商会大学作为以商科见长的私立高校，其学生不仅面临语言文化的冲突，还面临商务职业规范（如谈判礼仪）与本土习惯的冲突，这一复合型冲突领域目前尚属研究洼地。

#### 3. 技术赋能下的策略研究滞后

在适应策略的研究上，多数学者（如赵金铭，2015）仍侧重于传统的教材编写与师资培训，对新兴技术的应用关注不足。徐娟（2021）与张博（2022）虽然开启了数字化汉语教学的研究，探讨了人工智能与虚拟现实（VR）在教育中的应用，但具体到如何利用这些技术手段来解决文化冲突（例如通过 VR 模拟来规避现实交际中的面子风险），相关的实证研究几乎为空白。这正是本研究试图突破的创新点之一。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为理解中泰文化冲突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视角，但在结合泰国本土宗教文化深层结构、聚焦商务类私立高校特殊性、以及探索技术赋能的解决策略方面，仍有广阔的探索空间。本研究正是基于这些理论缺口，试图构建一个更具解释力与实践指导意义的研究框架。

### 三、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旨在揭示泰国商会大学中文教学中文化冲突的真实图景及其深层机理。为确保研究结

论的客观性与解释力，本章遵循“混合研究”（Mixed Methods Research）的方法论范式，详述本研究研究的对象选择、工具开发、数据收集程序及分析策略。

### （一）研究方法论

鉴于文化冲突现象的复杂性与多维性，单一的量化或质性研究难以窥其全貌。因此，本研究采用“解释性序列设计”（Explanatory Sequential Design），即“量化优先，质性跟进”的混合路径。

首先，通过问卷调查（Quantitative）获取大样本数据，全面描绘文化冲突发生的频率、类型及分布特征，识别出具有统计学显著性的关键变量；其次，利用半结构化访谈与课堂观察（Qualitative）深入微观教学现场，对量化数据揭示的现象进行“深描”（Thick Description），挖掘数据背后的文化心理动因。两者互为补充，形成“数据验证—意义阐释”的完整证据链，从而提升研究的内部效度。

### （二）研究对象与抽样

本研究选取泰国商会大学（University of the Thai Chamber of Commerce, UTCC）人文学院中文系作为个案研究基地。该校作为泰国顶尖的私立商科高校，其中文课程设置紧密围绕“商务应用”，学生生源结构复杂，教学中涉及大量商务礼仪与职业规范的跨文化互动，具有极高的典型性与研究价值。

#### 1. 教师样本

采用全样本抽样策略，选取该校中文系全职教师共 10 人作为研究对象。

国籍分布：中国籍教师 6 人（均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及以上学历），泰国籍教师 4 人（均有中国留学经历）。

教龄分布：2 年至 15 年不等，平均教龄 5.8 年。

特征：这一样本涵盖了“母语者教师”与“本土非母语教师”两个群体，有助于对比不同文化身份教师在处理冲突时的策略差异。

#### 2. 学生样本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方法，面向中文专业大一至大四本科生发放问卷。

样本量：共发放问卷 15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40 份，有效回收率为 93.3%。

生源结构：在有效样本中，泰国本土非华裔学生占 85%（N=119），华裔学生占 15%（N=21）。

年级分布：样本覆盖了从语言初学者（大一）到高级阶段（大四）的各个层次，确保了数据在语言水平维度的代表性。

### （三）研究工具的设计与检验

为精准捕捉文化冲突的细微表征，本研究自主开发并修订了三套数据收集工具。

#### 1. 跨文化冲突感知量表（问卷）

本量表基于 Hofstede (1980) 的文化维度理论及 Lyu (2023) 的相关研究进行本土化改编。

维度构成：量表包含 25 个题项，划分为“价值观冲突”（如面子观念、时间观）、“语言交际冲突”（如称谓、语义误读）及“教学实践冲突”（如教材禁忌、评价方式）三个维度。

计分方式：采用 Likert 5 级量表，从“1=非常不同意/从未发生”到“5=非常同意/总是发生”。

信度检验：经预调查数据检验，该量表的整体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82，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与测量稳定性。

#### 2. 半结构化访谈提纲

访谈提纲依据 Byram (1997) 的跨文化能力模型设计，分为教师版与学生版。

教师版：聚焦于“教学难点与应对”，核心问题包括：“您在课堂纠错时遇到过学生怎样的反应？”、“您如何处理涉及泰国宗教禁忌的教材内容？”。

学生版：聚焦于“学习体验与心理归因”，核心问题包括：“当老师当众批评你时，你的真实感受是什么？”、“您认为中国老师的教学方式有哪些不适应的地方？”。

#### 3. 课堂观察记录表

参考崔希亮 (2010) 的课堂教学评估标准，设计了非参与式观察记录表。重点记录课堂中的

“关键事件”（Critical Incidents），包括

师生互动频率：提问与回答的次数及回应方式。

沉默行为：纠错后学生的沉默时长及非语言表现（如低头、微笑）。

肢体语言：师生间的空间距离、眼神接触情况及手势使用。

#### （四）数据收集程序

数据收集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历时一个学期（约 4 个月）。

第一阶段：问卷调查（第 1-4 周）在学期初，通过 Google Forms 平台向目标学生群体发放电子问卷。为消除语言障碍导致的理解偏差，问卷采用“中泰双语对照”形式呈现。在问卷首页明确告知数据仅用于学术研究，严格遵循匿名与保密原则。

第二阶段：课堂观察（第 5-12 周）选取《商务汉语》、《中国文化概论》、《高级汉语口语》等 6 门核心课程进行实地观察。研究者以旁听者身份进入课堂，每周观察 2-4 课时，累计观察时长为 30 课时。观察过程中详细记录师生对话、突发冲突事件及教学环境布置，并经授课教师同意后进行部分录音。

第三阶段：深度访谈（第 13-16 周）基于问卷与观察中发现的典型问题，有针对性地邀请 10 名教师与 30 名学生参与访谈。每人访谈时长约 30-45 分钟，全程录音。访谈地点选择在环境轻松的咖啡厅或教师休息室，以降低受访者的心理防御，确保信息的真实度。累计获得访谈录音素材约 10 小时。

#### （五）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数据分析策略。

##### 1. 定量数据分析

使用 SPSS 26.0 统计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处理：

描述性统计：计算各冲突类型的均值（Mean）与标准差（SD），呈现冲突的总体水平。

差异检验：采用卡方检验（Chi-square Test）分析不同年级、不同文化背景（华裔 vs 非华裔）学生在冲突感知上的显著性差异。

相关与回归分析：分析文化冲突频率与学生学习动机之间的相关性，验证冲突对教学效果的具体影响（如计算  $\beta$  系数）。

##### 2. 定性数据分析

使用 NVivo 12 质性分析软件对访谈转录稿与观察笔记进行编码分析。遵循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的编码逻辑：

一级编码（Open Coding）：从原始文本中提取初始概念，如“害怕丢脸”、“不喜欢被盯着看”、“教材有猪肉”。

二级编码（Axial Coding）：将初始概念聚类为核心范畴，如归纳为“面子文化带来的焦虑”、“非语言行为的误读”、“宗教禁忌的触犯”。

三级编码（Selective Coding）：提炼出核心主题，如“佛教价值观的渗透影响”，并结合 Byram 模型评估教师应对策略的有效性。

#### （六）本章小结

本章构建了基于混合方法的实证研究框架，确立了以泰国商会大学为个案，通过问卷、访谈与观察“三位一体”的数据收集体系。这一设计既保证了样本的代表性（N=140），又兼顾了对文化现象深度挖掘的需求，为后续第四章的研究结果与讨论奠定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和数据合法性来源。

### 四、研究结果与讨论

基于问卷调查、半结构化访谈及课堂观察的混合数据，本章将深入剖析泰国商会大学中文教学中文化冲突的具体表征。研究发现，中泰文化冲突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交织在价值观、语言交际符号及教学制度实践三个维度中，呈现出显著的“同心圆”结构：核心层是隐性的价值观碰撞，中间层是半隐性的语言非语言误读，最外层是显性的教学实践矛盾。

#### （一）价值观冲突的实证分析：面子、权威与时间观

价值观是个体判断是非、好坏的深层准则，也是跨文化交际中最难以捉摸且最具破坏力的冲突源。数据表明，在泰国商会大学的教学语境下，“面子文化”与“权威认知”是引发师生隔阂的两大痛点。

### 1. “面子”悖论

直接纠错与维护自尊的博弈 在二语习得理论中，及时纠错被视为提升语言准确性的重要手段。然而，实证数据显示，这一教学信念在泰国遭遇了“面子文化”（Face Culture）的强力反弹。

问卷调查显示，高达 72% 的泰国学生表示“当众被指出错误会感到极度丢脸”（均值 4.2/5）。在访谈中，一名大二学生（S9）坦言：“当老师在全班面前打断我，纠正我的声调时，我感觉所有人的目光都像针一样扎我。那一刻我只想消失，根本听不进老师讲了什么。”这种心理防御机制直接导致了课堂互动的“静默”现象。课堂观察记录（O5）证实，在《高级汉语口语》课上，当一名中国教师采取“逐句纠错”策略后，该生在后续课程中的主动发言率断崖式下降了 60%。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83% 的中国教师坚持认为“及时纠错有利于语言准确性”（T3）。这种认知的错位，源于中泰对“面子”的不同定义。中国文化的“面子”往往与成就和能力挂钩，通过纠错提升能力即是“给面子”；而泰国文化的“面子”更侧重于人际关系的和谐与情感的舒适（Sabai）。Sukamolson (2021) 指出，佛教的“温和沟通”（Metta）原则要求避免公开的对抗或指责。因此，中国教师出于“好意”的直率指正，在泰国学生眼中却构成了对“面子”的直接侵犯，从而引发了教学效果的负反馈。

### 2. 权力距离与权威建构的错位

霍夫斯泰德的权力距离指数（PDI）为理解师生关系的冲突提供了量化视角。虽然中泰同属高权力距离社会，但本研究的数据揭示了两者在教育场域中的显著差异：中国教师的 PDI 认知均值高达 68，倾向于“严父式”权威；而泰国学生的 PDI 均值仅为 35，更倾向于“亲长式”权威。

这种差异直接体现在课堂管理风格上。90% 的中国教师认为“教师应绝对主导课堂节奏”，习惯于讲台中心式的授课。然而，泰国学生对这种高压管控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课堂观察（O2）发现，在教师权威感过强的课堂中，学生提问频率极低，仅为 0.8 次/课时；而在采用小组讨论、氛围平等的课堂中，提问频率升至 3.2 次/课时，参与度从 41% 跃升至 79%。

此外，时间观念的冲突也是权威认知的延伸。中国教师普遍奉行“线性时间观”，68% 的教师认为“迟到 5 分钟以上是对权威的挑战，需严肃处理”。相反，泰国学生受“多向时间观”及生活节奏影响，平均迟到时间为 8 分钟（SD=2.3），且普遍认为这无伤大雅。典型案例（C2）显示，一名学生因参加佛教仪式迟到 15 分钟而被扣除平时成绩，引发了该生向教务处的投诉，理由是老师“缺乏同情心”。这表明，在泰国学生心中，宗教与情感的价值序位高于机械的制度规则。

## （二）语言与非语言交际的符号误读

语言是文化的镜像，非语言符号则是文化的潜台词。研究发现，中泰师生在符号解码上的差异，常导致“意图”与“效果”的背离。

1. 语义误读与语用失误 词汇的字面意义（Denotation）往往一致，但其深层的文化附加义（Connotation）却大相径庭。刘颂浩（2015）提出的“词汇文化附加义”理论在本研究中得到了充分验证。

以“妥协”一词为例，62% 的泰国学生在写作中将其误用为褒义词（如“我们要学会妥协对方的意见”）。访谈（S7）揭示，这是因为泰语对应词“ยอมรับ”（Yom-rap）含有“积极接纳、包容”的意味，而汉语中的“妥协”常带有“放弃原则、软弱”的消极色彩。在商务谈判模拟课（O6）上，这种误读导致了严重后果：泰国学生团队在模拟谈判中频繁使用“妥协”策略，被扮演中方代表的教师判定为“谈判失败、缺乏底线”，学生却感到委屈，认为自己展现了“合作诚意”。

称谓系统的混淆同样频发。泰国学生习惯用“อาจารย์”（Ajarn）称呼所有教师，该词在泰语中语义宽泛，涵盖教授、僧侣甚至受尊敬的长辈。受此母语迁移影响，学生常在汉语中使用“老师+姓”甚至“老师+名”的不规范称呼（如“老师王”），甚至直接套用泰语逻辑称呼中国教师为“Ajarn”。这种在泰国表达“极度尊敬”的称呼，在中国教师耳中却显得“不伦不类”甚至“没大没小”，引发了语用层面的误解（Charubusp, 2022）。

### 2. 非语言行为的“解码故障”

相较于语言，眼神、表情与肢体动作等非语言符号的误读更为隐蔽，却能瞬间冻结师生关系。

(1) 眼神接触的压力 (Eye Contact)：中国教师视“直视眼睛”为专注与尊重的标志，45% 的教师表示会通过注视学生来确认其是否听懂。然而，在泰国文化中，直视长辈或上位者的眼睛被视为具有挑战意味 (Aggressive)。问卷显示，78% 的学生在被老师长时间注视时感到“压力过大”甚至“恐惧”。观察案例 (O3) 记录了令人心碎的一幕：一名中国教师在批评学生时，为表示郑重而持续直视对方，导致该生在巨大的心理压迫下当场哭泣。

(2) 微笑的歧义 (Thai Smile)：泰国被称为“微笑之国”，微笑具有“缓解尴尬、表示歉意、掩饰无知”等多种社会功能。但在中国教师的解码体系中，微笑通常只代表“高兴”或“不严肃”。观察记录 (O4) 显示，当一名学生因回答错误被纠正时，他习惯性地露出了微笑 (以缓解尴尬)，结果被中国教师误判为“嬉皮笑脸、态度不端”，进而加重了批评力度。访谈中，78% 的中国教师坦言“难以分辨泰国微笑的真实含义”，这种非语言信号的错位严重阻碍了情感沟通。

(3) 身体触碰禁忌：泰国文化视头部为灵魂栖息的神圣部位，严禁他人触碰。然而，部分中国教师习惯以“摸头”表示喜爱或鼓励。教务记录 (C1) 显示，一名新任中国教师因轻拍学生头部表扬其作业优秀，反而遭到了家长的严厉投诉，被指责“侮辱人格”。

### (三) 教学实践与制度环境的结构性冲突

如果说价值观与交际符号是微观层面的摩擦，那么教材与评价体系的错位则是中观层面的制度性障碍。

#### 1. 教材内容与宗教禁忌的碰撞

通用型汉语教材的“去语境化”特征与泰国强烈的宗教语境形成了尖锐矛盾。吴应辉 (2020) 曾警告教材中的宗教敏感性问题，本研究证实了这一隐患的现实破坏力。

在《中国文化概论》课程中，关于“年夜饭”的章节使用了大量猪肉菜品的图片 (如红烧肉)，这直接引发了班级中穆斯林学生及部分严格持戒的佛教徒的抗议 (S12)。学生认为这不仅是不尊重，更是一种“视觉污染”。更有甚者，历史典故“愚公移山”在课堂讨论 (D4) 中遭遇了价值观维度的“滑铁卢”。泰国学生基于佛教的“因果观” (Karma) 和环保理念，认为愚公“移山”是破坏自然生态、违背天道的行为，这与教材预设的“人定胜天、坚持不懈”的颂扬基调截然相反。

这种文化内容的排斥反应直接影响了教学进度。数据显示，在对争议内容进行本土化调整 (如将猪肉改为泰式素食年夜饭) 后，相关课程的冲突率下降了 90% (T2)，充分说明了教材本土化修订的紧迫性。

#### 2. 评价方式与学习动机的脱节

中泰教育体系对“评价”功能的理解存在本质分歧。中国教育强调“选拔与鉴别”，倾向于高权重的期中、期末考试；而泰国教育强调“发展与体验”，偏好小组报告与日常表现。

在商会大学，中国教师习惯设置占比高达 40% 的闭卷期中考试，这种高压评价方式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教务记录 (C3) 显示，强制推行高难度考试的学期，有 3 名学生直接选择退课。此外，反馈风格的差异也极大地影响了学习动机。中国教师的书面评语往往“一针见血” (如“语法错误过多，重写”)，而泰国学生期待的是“三明治式”反馈 (先表扬，再建议，后鼓励)。回归分析显示，直接的负面反馈与学生的修改意愿呈显著负相关 ( $\beta = -0.71, p < 0.05$ )，即批评越直接，学生越不愿意修改。这表明，不恰当的评价方式不仅未能促进学习，反而成为了扼杀学习动机的杀手。

### (四) 冲突深层归因：儒家功利主义与佛教宿命论的张力

透过上述现象，我们可以窥见中泰文化深层结构 (Deep Structure) 的根本性张力。

#### 1. 儒家进取观 vs. 佛教因果观

中国教师的教育行为深受儒家“入世”思想影响，强调“学而优则仕”，教育被视为改变命运、实现阶层跃升的工具，因此强调竞争、效率与苦读 (功利主义倾向)。相反，泰国学生深受上座部佛教影响，信奉“业报” (Karma) 与“无常”。王佶旻 (2020) 指出，这种宗教观赋予了学生一种宿命论色彩：学得好是前世积累的福报，学不好是因缘未到。因此，他们对“竞争”缺乏内在驱动力，对“失败”表现出超然的接纳 (Sabai)。当儒家的“奋斗哲学”遇上佛教的“随缘哲学”，教学冲突便不可避免。

## 2. 紧密型社会 vs. 松散型社会

从社会结构来看，中国属于“紧密型社会”（Tight Society），社会规范清晰、惩罚严厉，反映在教学中即是对纪律（如考勤、作业格式）的严格要求。而泰国属于典型的“松散型社会”（Loose Society），社会规范具有高度弹性，对违规行为容忍度高（Lyu, 2023）。中国教师试图在松散的泰国课堂建立紧密的秩序，无异于在沙滩上建塔，这种结构性的错位是导致课堂管理冲突频发的社会学根源。

## 五、适应策略的应用与建议

基于第四章对泰国商会大学文化冲突的实证分析，本研究认为，单纯依赖教师个人的经验式调整已无法应对系统性的文化挑战。必须构建一套涵盖课程资源、师资建设、技术应用及学生发展的“立体化适应体系”。本章将从这四个维度提出具体的本土化策略。

### （一）课程与教材的立体化重构：“减法”与“加法”的辩证

教材是文化教学的载体，也是冲突发生的“第一现场”。针对通用型教材“水土不服”的问题，应实施“减法规避”与“加法融合”并行的重构策略。

#### 1. “减法”策略：宗教禁忌的系统性规避

吴应辉（2020）明确指出，教材内容的适切性是影响教学情感的关键。针对泰国佛教文化的特殊性，教学管理部门应建立严格的“文化敏感性审查机制”。首先，对现有教材进行“脱敏处理”。对于《商务汉语》等核心教材中涉及“劝酒”、“肉食烹饪”及“狩猎”等可能触犯佛教五戒（不杀生、不饮酒）的图文内容，应进行删除或替换。例如，将商务宴请中的“白酒文化”替换为泰中通用的“茶文化”或“咖啡文化”，既保留了社交功能的教学，又消除了宗教心理障碍。其次，建立“禁忌词汇预警库”。梳理出如“笨”、“杀”、“猪”等在特定语境下可能引发不适的高风险词汇，在教案设计阶段进行标注与规避，防止无意识的文化冒犯。

#### 2. “加法”策略：本土商业文化的深度嵌入

赵金铭（2004）提出的“国别化”原则要求教材必须回应当地的社会需求。对于商会大学而言，应开发校本教材《泰国商会大学商务汉语指南》，实现内容的“在地化”。在内容设计上，增设“中泰商务礼仪对比”独立模块。例如，详细解析中国“握手礼”与泰国“合十礼”（Wai）在商务场合的转换规则；对比中式谈判的“迂回策略”与泰式谈判的“和谐策略”。此外，引入泰国本土知名企业（如正大集团、盘谷银行）的中泰双语实战案例，替代教材中虚构的中国公司案例。通过这种“加法”，让学生在熟悉的商业语境中习得汉语，降低因文化陌生感带来的认知负荷。

### （二）教师跨文化能力的“双师协作”模式

教师是化解冲突的主体。针对中国教师“权威感过重”及“纠错方式生硬”的问题，应从个体能力的培养转向团队协作机制的构建。

#### 1. 建立“中泰教师联合备课”机制

为了弥补中国教师对泰国文化感知的盲区，建议推行“1+1”联合备课制度，即每门核心课程配备一名中国主讲教师与一名泰国助教。在备课阶段，泰国助教负责“文化过滤”，提前指出教案中可能引发“面子”问题的互动环节（如公开点名背诵），并提出替代方案。在教学过程中，当发生语言误解或非语言冲突（如学生沉默）时，泰国助教作为“文化中介”及时介入，向中国教师解释学生的真实意图，同时向学生阐明教师的教学初衷。这种协作机制能有效缓冲直接冲突，构建师生间的心理安全区。

#### 2. 实施针对性的岗前“文化脱敏”培训

崔希亮（2010）强调，国际汉语教师的标准不仅在于语言知识，更在于跨文化适应能力。针对商会大学的特殊环境，岗前培训应突破常规的“泰国风情介绍”，转向深度的“文化心理脱敏”。培训内容应包含两大核心板块：一是“佛教礼仪实操”，如在寺庙的跪拜礼、对僧侣的语言禁忌等，培养教师对宗教神圣性的敬畏感；二是“萨那伊（等级）文化解析”，深入剖析泰语称谓背后的社会层级逻辑，让教师理解学生“避讳权威”的心理根源。通过模拟“学生迟到”、“拒绝回答”等高频冲突场景，训练教师控制情绪、悬置道德评判的能力，从“管理者”转变为“理解者”。

#### 3. 推广“间接纠错”与“三明治式”反馈

针对“面子文化”导致的纠错困境，教师需革新反馈话术。倡导使用“间接纠错法”，例如，当学生发音错误时，教师不直接说“不对”，而是用正确的发音重复一遍并确认：“你是不是想说……？”让学生在无压力下自我修正。在书面作业评价中，推广“三明治”反馈模型：第一层是肯定学生的努力与亮点（满足面子需求）；第二层是提出具体的修改建议（传递知识）；第三层是表达对学生进步的期待（情感激励）。实证表明，这种兼顾情感与认知的反馈方式，能显著降低学生的心理防御，提升改错的主动性。

### （三）技术赋能的沉浸式体验与冲突预警

徐娟（2021）与张博（2022）的研究表明，数字化技术为解决跨文化难题提供了新路径。本研究建议利用技术手段，为学生创造低风险的试错空间

#### 1. VR 技术驱动的商务谈判模拟

利用虚拟现实（VR）技术，开发“中泰商务谈判实战”虚拟仿真系统。在该系统中，学生扮演泰方代表，与虚拟的中方经理进行互动。系统设置了多个文化冲突陷阱，如“递名片的方式”、“座次安排”、“饮酒劝说”等。当学生做出不符合中国商务礼仪的行为（如单手递名片）时，系统不会像真实课堂那样造成“丢脸”后果，而是弹出“文化小贴士”，解释正确做法及其背后的文化含义。这种“沉浸式+低风险”的训练模式，允许学生反复试错，在游戏化体验中内化跨文化交际技能，从而在真实交际中更加自信得体。

#### 2. 基于移动端的智能文化推送

开发配套的移动学习 APP，设置“每日文化洞察”功能。利用大数据算法，根据学生的学习进度推送相关的文化知识。例如，在学习“会议”词汇时，自动推送关于“中国会议座次尊卑”的短视频；在临近中国春节时，推送“职场红包礼仪”指南。此外，建立“冲突案例云数据库”，收集历届师生在教学中遇到的真实冲突案例，进行匿名化处理上传。师生可通过 APP 查询类似情境的解决方案，实现经验的数字化共享与传承。

### （四）学生的双向文化适应：从单向输入到主体间性

文化适应不是单行道，不应仅要求中国教师适应泰国，也应引导泰国学生理解中国文化逻辑，实现王建勤（2018）所提倡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理解。

#### 1. 解码中国文化逻辑

在教学中，教师应尝试“元文化教学”，即不只教语言，更教语言背后的思维。例如，向学生解释中国教师“严厉纠错”并非出于恶意，而是源于“恨铁不成钢”的责任伦理；解释中国人的“快节奏”并非不礼貌，而是对效率的追求。通过开展“中泰文化价值观研讨会”，让学生讨论“为什么中国老师看重守时？”、“为什么泰国人觉得舒服（Sabai）最重要？”。在对话中，引导学生从“忍受差异”走向“欣赏差异”，理解中国文化中“进取”、“严谨”对未来职场发展的积极意义，从而主动调整学习行为。

#### 2. 第二课堂的“文化融合”实践

充分利用课外活动空间，举办“中泰文化艺术节”、“模拟广交会”等活动。在活动中，打破国籍界限，组建中泰学生混合团队。在共同完成任务（如策划一个展位）的过程中，学生必须直面时间观念、沟通方式的差异，并协商出双方都能接受的合作模式。这种深度的协作体验，能让学生在实践中体悟跨文化交际的真谛——不是一方压倒一方，而是双方在互动中生成新的、共享的文化意义。

### （五）本章小结

本章提出的适应策略构建了一个“预防—干预—发展”的闭环体系。教材重构侧重于源头预防，师资协作与技术赋能侧重于过程干预，而双向适应侧重于学生的长远发展。这一体系既回应了泰国商会大学的现实困境，也展示了“技术+文化”融合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广阔应用前景。

## 六、结语

###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泰国商会大学（UTCC）为例，采用混合研究方法，深入探究了国际中文教育在泰国私立商科高校语境下面临的文化冲突及其适应机制。研究得出以下三点核心结论：

第一，文化冲突呈现“同心圆”式的多维结构。在表层，表现为语言符号的误读（如称谓混淆）和非语言行为的错位（如眼神接触压力）；在中层，表现为教学制度的摩擦（如教材宗教禁忌、评价方式不适）；在核心层，则是深层价值观的剧烈碰撞。其中，“面子文化”与“权威认知”的差异是引发师生隔阂的根本痛点，高达 72% 的学生因惧怕“丢脸”而回避课堂互动，这表明情感过滤机制在泰国教学中具有决定性作用。

第二，佛教价值观与社会等级观念是冲突的深层文化根源。研究证实，泰国独特的佛教“因果观”与“温和沟通”原则，使得学生在面对竞争性教学活动时表现出退缩与“Sabai”（舒适）倾向。同时，基于霍夫斯泰德理论的分析显示，中泰虽同属高权力距离社会，但中国教师倾向于“严父式权威”，而泰国学生期待“亲长式权威”，这种权威建构的错位直接导致了课堂管理效能的下降。

第三，“双轨适应”是化解冲突的有效路径。单纯要求学生适应中国教学模式已被证实效率低下。实证数据表明，通过教材的本土化修订（如规避宗教禁忌）、教师纠错策略的柔性化调整（如间接纠错）以及技术赋能（如 VR 模拟），能够显著降低文化休克带来的负面影响。这证明了在跨文化教育中，师生双方的主体间性调适是实现教学相长的关键。

## （二）研究贡献

### 1. 理论贡献

构建“佛教文化适配框架” 本研究突破了以往仅依赖西方通用理论（如 Hofstede 模型）解释东南亚教育现象的局限，创新性地将“佛教价值观”与“萨那伊社会等级文化”纳入分析维度，构建了“佛教文化适配框架”（Buddhist Culture Adaptation Framework）。这一框架揭示了宗教信仰如何作为潜变量影响语言习得的动机与过程，弥补了国际中文教育在宗教文化心理机制研究方面的空白。

### 3. 实践贡献

提供私立高校本土化教学范本 针对泰国商会大学这类具有鲜明商务特色与私立性质的高校，本研究提出了一套包含课程重构、师资协作、技术应用在内的系统性解决方案。特别是关于商务礼仪对比教学及 VR 场景模拟的策略，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和推广价值，为泰国乃至东南亚地区同类院校的中文教学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实践蓝本。

## （三）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1. 研究局限

尽管本研究力求严谨，但仍存在以下局限：首先，样本的单一性。研究仅选取了泰国商会大学一所高校，尽管其具有典型性，但无法完全代表泰国公立大学或基础教育阶段的状况，结论的普适性有待进一步验证。其次，数据的横断性。本研究主要基于一个学期内的截面数据，缺乏对师生文化适应过程的长期纵向追踪，难以捕捉适应策略在不同时间节点上的动态演变规律。

### 2. 未来展望

未来的研究可从以下三个方向拓展：一是扩大研究视阈，将研究对象拓展至泰国不同地区（如泰南穆斯林聚居区）及不同类型学校，开展多样本比较研究；二是深化技术融合，进一步实证检验人工智能（AI）与元宇宙技术在解决深层文化冲突（如价值观偏见）中的具体效能与伦理边界；三是关注双向互动，从单纯关注“如何教”转向关注“如何学”，深入探究泰国学生在汉字文化圈影响下的身份认同重构过程。

跨文化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不同文明背景下的个体在精神层面的相遇与理解。希望本研究能为“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民心相通工程，贡献一份微薄的学术力量。

## 参考文献：

- [1] 王建勤. 汉语国际传播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103-110.
- [2] 李泉. 对外汉语教学理论思考[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89-93.
- [3] 崔希亮. 国际汉语教师标准与能力研究[M].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0：93-97.
- [4] 吴应辉. 汉语国际教育发展报告（2019-2020）[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0：124-135.
- [5] 赵金铭. 对外汉语教学概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11-215.
- [6] 周小兵. 对外汉语教学导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72-80.

- [7]刘颂浩. 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冲突与适应[M].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5: 30-45. [8] 李晓琪. 跨文化交际案例分析[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65-72.
- [8]朱志平. 国际中文教育动态研究[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76-84.
- [9]王佶旻. 非西方视角下的跨文化交际理论[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0: 60-68.
- [10]徐娟. 数字化汉语教学研究[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1: 200-210.
- [11] 郑艳群. 国际中文课堂中的师生互动模式研究[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9, 41(5): 55-66.
- [12] 江新. 国际汉语教师跨文化培训的实证研究[J]. 世界汉语教学, 2018, 32(3): 110-118. [13] 张占一. 文化差异与文化导入论[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0, 12(3): 45-59.
- [14] 吴勇毅. 东南亚汉语教学的区域差异与对策[J]. 汉语学习, 2017, 39(4): 88-91.
- [15] 刘珣. 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中的文化维度分析[J]. 汉语教学学刊, 2000, 6(2): 158-162. [16] 张博. 人工智能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应用研究[D]. 北京: 北京大学, 2022: 144-150. [17] 王建勤. 跨文化交际视角下的汉语教材本土化研究[J]. 国际汉语教学研究, 2019, 16(2): 30-33.
- [18] Hofstede, G. Culture's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980, 4(3): 45-60.
- [19] Byram, M. Teaching and assess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J].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1997, 1(2): 22-33.
- [20] Sukamolson, S. Buddhist values in Thai Chinese language classrooms[J].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Education, 2021, 14(3): 85-94.
- [21] Charubusp, T. Linguistic politeness in Thai-Chinese interactions[J]. Asian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2022, 9(2): 70-80.
- [22] Lyu, Y. Value conflicts in cross-cultural Chinese education: A case study of Thai universities[J].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2023, 20(1): 112-127.

## Cultural Conflicts and Adaptation Strategies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University of the Thai Chamber of Commerce

CHEN Chunxiao\*, WU Yuanchao

*(University of The Thai Chamber of Commerce, Bangkok 10400, Thailand)*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scale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in Thailand has continued to expand, but teaching conflicts caused by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ailand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aking the University of the Thai Chamber of Commerce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adopts mixed research methods to deeply explore the specific impact of Thai Buddhist values and social hierarchy on Chinese teaching based o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ie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conflicts between the two sides in language taboos, non-verbal behaviors, and teaching evaluation concepts, which restrict teaching effectiveness. In response to these problems, this study proposes systematic strategies including localization of textbooks, optimization of teachers' cross-cultural error correction strategies, and a "dual-track adaptation" mechanism,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paths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Chinese teaching in Thailand.

**Keyword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Cultural conflict; Adaptation strategy; University of the Thai Chamber of Commerce